

安德列耶夫创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人”传统

戴卓萌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影响历来为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们所关注。从安德列耶夫同时代人到当今学者, 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始终不减。究其原因, 是因为两位作家的创作主题和提出的问题彼此相近, 他们对宗教道德问题的同样关注, 以及对人的心理及其行为的非理性和无意识自发性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 两位作家在解决存在主义问题方面, 在表述各自关于人、宗教、道德的观点和创作手法上却大相径庭。

关键词: 安德列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孤独; 界限; “地下人”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对古典文学传统继承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创新, 作家们在对话的基础上使相关主题得到了更深的挖掘和拓展。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意识中, 伦理问题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初, 伦理层面的问题不再处于中心地位。摆在作家和诗人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确立思想和行为的界限, 实现对存在本质的认知。新的文学意识在安德列耶夫笔下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种意识旨在廓清关于人和世界的新观念。安德列耶夫将事实表象置于真理的对立面, 凭借艺术家的主观感受来创造艺术中的现实。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安德列耶夫善于在不同层面上发现问题, 其作品中的肯定与否定富有强烈的动态特征, 具有鲜明的二律背反性。充斥在安德列耶夫作品中的那种惊慌、疯狂和恐怖并非完全源于社会的动荡, 更多是来自于对上帝信仰的崩溃, 导致孤独的个体必须直面荒诞。

2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德列耶夫创作的影响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影响, 安德列耶夫早在1916年写道: “在离世的作家中, 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接近。我认为自己是他直接的学生和追随者。他的内心有很多阴暗面和至今未能猜透的东西, 但它们更吸引我。” (Л.П.Гроссман 1927: 279)

安德列耶夫同时代的评论家已经发现两位作家在创作情节和意识形态问题方面的相似性, 并认为这种相似性是年轻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毫无意义的简单模仿。如《莫斯科信息报》评论家Б.В.纳扎列夫斯基在评论安德列耶夫的《理念》时提到,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简写版的儿童读物”。(В.И.Беззубов 1984: 85) 一些评论家往往把这一相似性归结为两位作家对不同精神病理学描写的癖好, 指出在对具有反叛精神和非理性特征, 却无法给出终极答案的人的探求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德列耶夫的观点也十分相似。继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 安德列耶夫发现, 除了理性思维, 人身上还有一种自发的潜意识力量, 即对毁灭

和自我毁灭的欲望。

有趣的是，这同时亦是两位作家区别之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所谓‘明悟’的我，即本质上的自由精神，构成了个性的核心。对安德列耶夫来说，人之个性深层的基础为某种无意识的东西，后者表现为对一些阴暗的本能欲望自然的追求，以及毫无顾忌的恣意妄为与自我毁灭，尽管作家理所当然注定要描绘出判若天渊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对抗。因此认为安德列耶夫对人性之理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的观点值得商榷。安德列耶夫仅在人性的一个方面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其他方面则完全不同。”（Г.Б.Курляндская 1996: 28）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人同自身中非理性的黑暗因素搏斗的可能性，而安德列耶夫则看不到人的出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德列耶夫艺术世界的一个鲜明区别在于上帝和宗教在人生中的作用完全不同。安德列耶夫同时代的评论家已指出这一区别。如有评论家就认为在安德列耶夫身上更多体现的是“魔鬼”、“恶魔”的因素，而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一个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В.И.Беззубов 1984: 85）“安德列耶夫在思想上仿佛接受并发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叛者主题，即伊万·卡拉马佐夫主题。”В.里沃夫-罗加切夫斯基将安德列耶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伊万·卡拉马佐夫”。（В.И.Беззубов 1984: 87）因此，安德列耶夫上帝的反叛者意识与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基督理念最终是大相径庭的。

安德列耶夫的某些作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联系毋庸置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类型为安德列耶夫所接受并在加略人犹大、克尔任采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形象中进行了重新认证。冷眼看上去，安德列耶夫上述主人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彼此间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在将他们进行比较时，他们内心深处的同一性便一目了然。

3 安德列耶夫主人公的“地下人”特征

3.1 加略人犹大

小说《加略人犹大》是一个充满喻意和象征的寓言。在加略人犹大身上体现的是某种“地下人”的心理类型。И.Ф.阿年斯基在《反映之群书》中指出，安德列耶夫的犹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具有相当的相似性，“我们只要看一下犹大前后不一致的谎言和对耍弄人的无限渴望就足够了。”（И.Ф.Анненский 1979: 149）无论是“地下人”，还是犹大，在小说的开头他们就无法与周围人融洽相处。一方面，他们均竭力向周围人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两人又均感受到与世界格格不入产生的痛苦和对克服这一分裂状态的期望。在内心深处，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爱和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一个偏执狂，极富挑衅性，他在仇恨和蔑视朋友的同时，又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获得他们的好感和尊重：“在胆小畏缩这种寒热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仍不由得时时幻想超群绝伦，唯我独尊，吸引众人，让他们喜欢我——哪怕只是‘因为我高深的思维和风趣无双’呢。”（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3a: 141）加略人犹大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其外表獐头鼠目而遭人唾弃。除了耶稣，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见到他就产生厌恶之感，认为“这样的人不可能做善事……”（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249）与“地下人”相同，犹大特意竭力用虚伪和明显的谎言、毫无来由的恶意、愚蠢的行为加深自身外貌给人带来的不舒服的印象。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踌躇满志，自命不凡：“‘在后面走的人是我，一个高尚、英俊的犹大……’‘你为什么称自己英俊呢？’福马感到惊奇。”（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258）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德列耶夫主人公的语言特点也颇为相似。“地下人”的忏悔以悖论结束，这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辩白¹：“这样的人很蠢，对此我无意同你们争论，但是，也许，一个正常人就应当是愚蠢的，你凭什么说不呢？这甚至太美了也说不定。”（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3a: 104）

在犹大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救了耶稣性命之后，犹大欺骗民众说此人并非预言

家，只是一个普通骗子、小偷和混蛋。福马对他说：“‘你的行为很差劲，现在我相信，你的父亲是魔鬼。是他教唆你的，犹大。’……‘那就是说，魔鬼教唆了我？好了，好了，福马。而是我救了耶稣？那就是说，魔鬼爱耶稣，那就是说，魔鬼需要耶稣和真理？好了，好了，福马。但要知道，我的父亲不是魔鬼，而是一头山羊。也许，山羊需要耶稣？嘿？而你并不需要他，不是吗？连真理也不需要？’”（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254）

犹大和“地下人”一样，向大家坦述自己的缺点，不管别人是否愿意倾听。他努力阻止别人对他做出否定的评价，他仿佛在说：事实上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他的疯愚和自我毁灭甚至发展到使所有人相信，他就是山羊的后代。为了找乐子，他还抹黑自己的母亲。与“地下人”相同，自黑的动机是主人公竭力要给人以无耻、猥琐的印象，以此区别于周围人和与他对立的社会。他们都以为通过惊奇的坦率和愤世嫉俗就可以引起周围人的共鸣和赞叹。

于是，一方面，对于怨恨者，犹大所行实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他公开蔑视周围人的愚蠢，嘲笑他们未见过世面，胆怯懦弱。另一方面，同“地下人”一样，他人的意见对犹大来说又极为重要。犹大非同寻常的虚荣心迫使他参加同耶稣最强壮的门徒彼得进行从山上扔石头这样极度耗力的比赛。犹大内心隐秘的痛苦在于，在耍弄和挑衅周围人的同时，他始终为没能得到大家的关爱和关注而苦楚万端：“很快结果是这样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比肩接踵地走在前面，而犹大，作为获胜者的犹大，强者的犹大，一个人在后面步履蹒跚，边走边吞咽着暴起的尘土……谁也没有想起犹大。”（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258）

犹大最渴望得到的是基督的爱，即便有时他偷钱、撒谎、诽谤、吹嘘，都是要以此引起耶稣对他愤怒的关注。他千方百计地逢迎耶稣：在乱石缝中采撷花朵讨导师喜欢，购买昂贵的圣油、龙涎香和酒，给耶稣送来他酷爱的孩子们。最终犹大又得到了什么？他不时的做作、自卑和对耶稣疯狂的趋承又是为了什么？我们认为，犹大如同“地下人”一样，可以被称之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物，他一心想成为耶稣心爱的门徒，并确信自己是导师身边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耶稣的众门徒请求解决他们的争论——谁最得耶稣的欢心，是彼得还是约翰时，犹大“用干瘦的手指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庄严地再次重复：“‘我！我将在耶稣的左右！’”（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258）

犹大与“地下人”之间的相似是不言而喻的：耶稣是上帝，而犹大企图成为仅次于上帝的人，即王者中最高尚、最重要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地下人”、《少年》中的阿尔卡基·多尔戈鲁基均表露出这样的愿望。在实践不无内在矛盾的“地下”逻辑时，犹大确信，为了向耶稣证明自己的爱，他应该将其杀害。犹大要向耶稣展示，那些门徒自诩的忠诚在危险时刻一文不值：身强力壮的彼得将背弃主三次，而主心爱的门徒约翰会为了苟且偷安出卖自己的导师。除了犹大，所有人都会抛弃耶稣，只有他犹大会紧随在导师的左右：“我会下地狱！在你地狱的火焰上我将打铁并毁掉你的天空。好吗？那时你会相信我吗？耶稣，那时你会和我一起返回地面吗？”（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304）

在犹大的背叛中，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人”最高的内心意愿，即要体验把亲爱人的生命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快感。他努力确认权力的愿望远远重于自己最亲近人的性命，为此犹大甚至毫不在乎自己的生命。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人”所追求的最高层次：人有权为自己和他人选择最坏的结果，最坏和最非理性的选择往往是最所向披靡的。

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愿望下，犹大和“地下人”的相似性还表现在二者均是从自己和别人的痛苦中获取乐趣，同样的对个人寡廉鲜耻和卑鄙龌龊行径的自我陶醉。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地下人”在嘲笑期盼新生活的丽莎并撕碎她未来生活图景时的丰富感受。在折磨丽莎和自己的同时，主人公感到心满意足。在安德列耶夫小说中，受到士兵鞭打的耶稣的痛苦折射到了犹大身上，但与此同时，后者仿佛又在享受着这一场景：“传来阵阵有力的哈哈笑声，

犹太也微笑了一下——仿佛某人用有力的铁手指撕裂了他的嘴。”（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287）

想象导师被处死的病态快感还表现在拿耶稣性命同教会做交易的场景中：“30个银币！一滴血不值一个奥波勒斯小银币！一滴眼泪不值半个奥波勒斯小银币！一个呻吟是四分之一一个奥波勒斯小银币！而那些喊叫！那些抽搐！而为了使他的心跳停止呢？而为了让他闭上眼睛呢？这些都是免费的吗？”（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275）

犹太和“地下人”一样玩世不恭，后者含着眼泪高兴地嘲笑他所拥有的最珍贵的青春年少理想。贬低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给“地下人”带来满足感，他们兴高采烈地要把世界上弥足珍贵的东西都踩在脚底下。这些心理特征与对经常性反思的癖好不无联系，这一反思将“地下人”坚实有价值的体系蜕变为松软的沼泽地。在安德列耶夫的笔下，犹太是基督门徒中最喜爱思考的人，他常常对社会公理提出质疑并反复思索。正因为此，犹太才和耶稣门徒中最多疑的福马关系接近。但福马为人憨直，思维迟钝，不善于解答犹太的问题；福马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犹太却是一位哲学家。犹太的反思如同“地下人”的认识一样使人痛苦不堪。周围人甚至发现了犹太非同寻常的痛苦妄想：“当犹太的一个眼睛在灵活狡黠地转动时，他看上去朴实、善良，当他两个眼睛一动不动地停滞下来并在他凸出的额头皮肤聚集成土堆和皱褶时，在这个头骨下翻滚的关于某种完全特殊思想的痛苦就谜一样地产生了。”（Л.Н.Андреев 2012b: 270）

总之，在犹太的性格中可以发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人”诸多的相似。但是，作为人物类型的代表，安德列耶夫的主人公拥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与“地下人”相比，犹太不仅恶行更多，他身上的魔鬼成分同样更多。在这方面，他更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另一些罪孽深重的主人公（如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和斯塔夫罗金）。和这些主人公一定程度上相似的还有安德列耶夫作品中的其他“地下人”，如《理念》中的克尔任采夫医生。

3.2 克尔任采夫医生

安德列耶夫同时代的评论家和研究者曾多次关注作家的短篇小说《理念》与小说《罪与罚》之间的承继性。（请参见Г.Б.Курляндская 1996, М.Я.Ермакова 1968）两部作品的相似性表现在情节和所反映的理念方面。不仅如此，克尔任采夫本人在自己的笔记中还提到拉思科尔尼科夫，并将自己同他进行比较：“对一个杀人犯、对一个罪犯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警察局，不是法庭，而是他本人，他的神经，他那在著名传统下培养出来的身体之强大的抵抗。请回忆一下拉思科尔尼科夫，这个如此可怜和如此荒唐地成为牺牲品的人，回忆一下与他相似的人。”（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397）

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鲜有学者关注到《理念》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类型间的联系，只有别祖波夫在《列昂尼德与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相互联系。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安德列耶夫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通常出现的不是‘理性的’或‘合理的’人物，而是某些突发本能的、率性妄为的、‘性情豪迈的’悲剧性人物。安德列耶夫的主人公身上非理性、无意识的率性之力和本能的力量同样极为强大。对他来说，人依旧是一个秘密。”（В.И. Беззубов 1984: 97）即“无论对安德列耶夫，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恶的本源和初始不仅决定于环境和人的生活，还取决于人自身。”（В.И. Беззубов 1984: 95）

别祖波夫指出了《理念》和《地下室手记》的相似之处：克尔任采夫医生的书信中含有内在的对话体系。不仅如此，这位学者还指出了主人公超乎寻常的智力活动。（В.И. Беззубов 1984: 101—102）此外，克尔任采夫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是一个“执着于理念的主人公”。（В.И. Беззубов 1984: 95）我们认为，克尔任采夫医生同“地下人”的相似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典型的“地下性”特征：不加掩饰的近乎自恋狂的傲慢。在忏悔书的第一页，主人公即宣称，他将人分成“奴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数百肥胖的人”）和我们——被筛选出来的选民（选民的存在再一次佐证了在人类中存在着成千的无赖和低俗的人）。（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396）

主人公对自己的态度反映在下列自我评价中：“爱思考的人”、“坚强的人”、“冷漠、理性的人”、“聪明人”、“远没有失去艺术感和幻想”、“令人惊奇的、出色的演员”。（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00—407）他还指出自身所拥有的其他品质：“健康的头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等等。（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00）在自己的手稿中，他还承认对自己的爱：“我爱自己，爱自己肌肉的力量，爱自己明晰、正确的思想的力量。……我是我唯一尊敬的人。”（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399）

克尔任采夫对周围其他人的评价是：“肥胖的人”、“无赖和低俗的人”、“奴隶的天性”、“傻子”，而女人则是“低级生物”，是“天真愚蠢和轻信的人”，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别洛夫是“肥猪”，“他们所有人都那么愚蠢”，“他们对好的游戏来说太卑微”，“我一直以来把她当作一个有缺陷的、呆板的、生来就是奴隶的生物”；他对父亲的评价是：“一个可怜的，纸糊的小丑，小偷和胆小鬼”以及“我的父亲是个酒鬼，小偷和胆小鬼”。（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02—412）

这一切让读者觉得克尔任采夫医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更为自信。克尔任采夫最初并没有因孤独或者不被承认而感到苦恼。正相反，他喜欢并非常珍惜独处的时光。在无限自我满足的感觉中，有一天突然冒出了某个“地下人”的理念：“你以为你是在掩饰，实际你是一个疯子。你卑微，你凶狠，你愚笨，你是克尔任采夫医生。一个克尔任采夫医生，疯子克尔任采夫医生！”（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23）

一旦当克尔任采夫觉得他唯一的宝贵之处、“最伟大的奇迹和最深邃的奥秘”、他的“理念”背叛了他时，主人公就感到“一种令人发狂的恐惧”，发现自己身处“无限空旷的空间”中，孤独已不再是他的盟友：“当我不知道单个的我是谁，当不知名的他们在用我的嘴、我的思想、我的声音在讲话时，令人疯狂的孤独感出现了。”（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33）

当然，对安德列耶夫的主人公来说，孤独并非“丑恶、臭气熏天的地下室”，而是寒冷、充满敌意和永恒的宇宙。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曾经说过，“永恒就是长满蜘蛛的乡村澡堂”，（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3b: 221）其实质就是“地下性”。一旦主人公失去对自我意识的掌控，他所有对人的高傲蔑视就会变成对那些智力平庸、人生惨淡、爱戴并信仰上帝的人的“地下室式的”仇恨和嫉妒。同所有的“地下人”一样，克尔任采夫远离“活的生活”，在他和自然存在中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冷漠和恣肆的墙一样的东西成为他生活的信条。因此，当他的“理念”背叛了他，他意识到，他从一个“超人”变成了一个“超级的空无”时，他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可以游刃有余地掌控自己的意识，而是失去了思考和感觉的能力，变成了一只不幸的“蝌蚪”。这时，以前让他满足的孤独开始让他感到压抑和恐惧。

克尔任采夫医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相似性不仅表现在心理恐惧方面，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假设，克尔任采夫是经过安德列耶夫重新构思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尤其是注意到克尔任采夫本人在其手记中还提到拉思科尔尼科夫，并将自己同后者进行比较）。

安德列耶夫的主人公同样经受着理念的困扰，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将自己的理念付诸于生活中。这一理念产生之前主人公遭到了侮辱。他向心爱的女人达吉娅娜·尼古拉耶夫娜求婚，后者对他的求婚仅报以哈哈大笑，之后嫁给了他的朋友。克尔任采夫不止一次地强调说，这一拒绝对他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为此主人公不能原

谅达吉娅娜·尼古拉耶夫娜：“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哭泣过，从来没有害怕过。我站在她面前颤抖着。我颤抖着并看见她紧咬嘴唇，当她抬起含笑的双眼，我伸出双臂想拥抱她。我的一只胳膊悬挂在空中，她笑了起来，笑了很长时间，直到笑够为止。”（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93）

无法摆脱和忘却所经受的屈辱，这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地下人”的典型特征。如“地下人”对一名军官带给他的侮辱耿耿于怀长达两年。正是达吉娅娜·尼古拉耶夫娜的嘲笑引起了克尔任采夫的愤怒，而嘲笑是对“地下人”最可怕的侮辱，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感到最惊恐的莫过于此。

主人公自尊心受到伤害成为他理念产生的动因。为了报复侮辱他的人，克尔任采夫决定伪装成精神病患者，利用免罪杀死自己的情敌，然后再通过顺利医治好精神病，重获自由，回归正常生活。计划的第一部分便是装疯和谋杀。主人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逞，因为克尔任采夫在道德上早已准备好去干任何无耻的勾当，只要这一勾当对他有利并能给他带来快乐。主人公高傲并陶醉地讲述他以前的下流行径（这种吹嘘带来的满足使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极为相似）。比如，克尔任采夫坦然地讲述他读大学时，偷了一名特困生的钱并转嫁于粗心的收银员。这时，主人公特别满足地强调，他用偷来的并不为他所需要的钱订了一顿大餐。这一切都是为了试验他是否能够受到良心的谴责。

对他人掌控的可能性和支配他人生活的权力欲迷诱着克尔任采夫，让他醉心于上帝的角色。在青年时代，主人公通过伪装喜欢对方获取他人的信任，“我不再注意他的小心思，带着对自我力量高傲的意识和内心毫无牵挂的自由感离开了他。”（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01）这一片断与《地下室手记》中丽莎的遭遇极为相似，“地下人”正是借助于这些“可怜的话”（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3a: 173）获得了丽莎的信任与爱，然后又反过来羞辱她。

克尔任采夫强调，他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毫无共同之处，他“对现行的道德观抱有深恶痛绝和千真万确的蔑视”。（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397）主人公缺乏道德观，这是他固有的品质并成为他为人做事的准则：“你们会说，不可以偷窃、杀人、欺骗，因为这是缺乏道德和犯罪，而我向你们证明，可以杀人、抢劫，这非常道德。”（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29）

对克尔任采夫和“地下人”来说，反思能力是价值观的基础。根据两个主人公的观点，他们和大多数人的区别正在于此。身居“地下”的人十分珍视自己意识中某种固有的畸态和反道德，因此克尔任采夫赞赏自己理念的威力、动能和真谛性。然而，一旦理念“背叛了”他，那么“内心自由”的感觉便消失殆尽，理念就从地平线坠入“地下”：“我清楚地意识到，总的来说这非常少见，我与所有这些人是多么的合不来，在这个世界上又是何等的孤独。我永远是被禁锢在这个头脑中，禁锢在这所监狱中。”（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406）

克尔任采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人”的相似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手记的方式（叙述呈忏悔式且极为坦率），文本构成的形式（同专家的对话），前后矛盾、富有挑衅性的语言，总是试图为自己辩解。读者和克尔任采夫的关系如同与“地下人”一样，被作家再现为一种敌对的关系。

在叙述时，克尔任采夫时而使法官确信，他绝对健康，他们不应该关注他的精神病症状（诸如糟糕的遗传、童年时代的癫痫、突然发作的惊恐、变幻无常的笔迹），时而开始使周围人相信他确有精神失常，仿佛是在求助并试图摆脱对精神疾病原本的恐惧。主人公矛盾的行为和“地下人”相同，后者先是试图用自己的卑鄙让读者震惊，然后又开始引导他们相信截然相反的东西。

《理念》与《地下室手记》的相似性还体现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上：展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自我封闭的结局。Л.А.叶祖伊托娃在《安德列耶夫创作中的〈罪与罚〉》一文

中明确指出，克尔任采夫思想的深度、“出人意料的无价值性”（Л.А.Иезуитова 1970: 338）和证明自己比别人高明的滑稽行为之间严重不相称。他口中述说的是对人和理念创造者庄严崇高的赞颂……然而，一旦克尔任采夫停止讲述开始行动时，他立刻就成为一个卑微可怜的侏儒，变成了对自己这个演说家的讽刺。（Л.А.Иезуитова 1970: 338—344）当他解释杀人“只是想尝试一下自己的力量”时，他把自己比做南森，后者冒着生命危险攀登上禁止攀爬的高山，仅仅是因为高山禁止攀爬。克尔任采夫没有发现这种比较的荒谬性。（Л.А.Иезуитова 1970: 339）对此，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一语中的：“斯麦尔佳科夫与克尔任采夫的区别在于，斯麦佳科夫为钱财而行凶，而克尔任采夫只是为了获得成为斯麦尔佳科夫的荣耀。”（转引自Л.А.Иезуитова 1970: 338）

“地下人”同样具有某种类似的东西：在他身上，思想的深度和尖锐性以自相矛盾的形式与卑微、无意义的行为交织在一起。“地下人”尤为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而对他人则缺乏同情心，他的公开忏悔同样是缺乏真诚的。与克尔任采夫不同的是，“地下人”经常意识到自身中的矛盾并在手记里不断对其进行修正，而平淡无奇的思想意识则把克尔任采夫送进了精神病院。

3.3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

安德列耶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同样带有“地下人”之特征。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安德列耶夫在这部短篇中揭示了超人主题，尽管两位主人公结局彼此相异。叶尔玛科娃指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截取基里洛夫出众个性的同时，努力展示它（顺便提一下，如同斯塔夫罗金的个性）是如何被‘思想吞噬’并导致毁灭的，那么安德列耶夫正相反，他所截取的是表现一个最平庸的人欲竭力证明这一个性是如何在同一种‘超越人类’、‘向超人迈进’的‘理念’影响之下成长为一个鲜明、独特的个性。”（М.Я.Ермакова 1968: 145）

安德列耶夫于1901年8月9日在给高尔基和伊兹麦洛夫的信件中承认说，在他看来，这部短篇的艺术性并非很成功。与此同时，作家多次指出，《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故事》的思想性对他来说更为重要，作家将其置于其他早期作品之上……（转引自Л.А.Иезуитова 1970: 91）安德列耶夫在1900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唯一能够证明我存在的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故事》”。（转引自Л.А.Иезуитова 1970: 92）由此可见，在安德列耶夫艺术体系中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形象至关重要。这一重要性不在于主人公形象塑造得如何成功（诚然，与加略人犹大和克尔任采夫相比，这并非是安德列耶夫笔下最鲜明的形象），而在于作家发现了“真正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思考模式”（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自己的“地下人”）。尽管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没有充分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特征，但仍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性。

和“地下人”一样，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不满意自己的存在。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不得不妥协的一个事实”。主人公承认他相貌平平，智商不高，缺乏天赋，木讷、平庸、贫穷。对自己的上述看法伴随着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一生：他时而平心静气于自己的平庸，时而又对其深恶痛绝。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曾试图从现实中逃避到可以随意主宰别人命运并享受他人崇拜的理想世界中：“于是不知不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成为一个天真、浅薄的幻想者。他时而想象自己赢得20万卢布，去欧洲旅行……时而想象自己立刻变得英俊、睿智，具有令人无法抵抗的魅力。听完歌剧后，他想象自己是歌唱家；读完书后，他想象自己是学者；走出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时则是画家，但每次当一群人出现时，‘他们’——诺维科夫和其他人——都会折服于他的俊朗和天才，而他会让他们成为幸福的人。”（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223）

理想和现实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导致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与现存世界产生了隔阂，他也

如同“地下人”一样只在书籍中寻找慰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颠覆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理念。超人思想完全控制主人公的头脑，最终导致他自杀。在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内心滋生出的对没有赋予他超人品质和能力的大自然的抗议，其产生的根源完全来自于“地下”。所有的“地下人”不仅损害周围人，还损害整个世界（无论是上帝或者是大自然，两者都没有把他创造得完美无暇）。在安德列耶夫笔下，主人公的怨恨完全体现出来：犹大出卖耶稣是因盲目的爱与仇视美好事物所致，试图从神的创造中为自己获得最美好的东西；克尔任采夫发疯是因为他忠诚的“理念背叛了他”；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决定毁灭自己，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没有给他带来美貌、智慧和物质保障的吝啬的大自然。尼采的书籍使得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植根于“地下”。同朋友们的偶遇以“主人公开始嚎啕大哭，然后称大家为白痴，称自己为超人”而结束。这种令人反感的古怪行为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人物类型极具典型意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进入“地下”伴随着强烈的反思（“强化的意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典型的特征）：“自从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头脑从来没有像最近昼短夜长的日子里这么辛苦地工作过。缺血的大脑没有在他寻找真理的地方配合他，列出现成的公式、概念和句子。他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像是不辞辛劳往山上拉重物的马匹，他开始喘息，跪了下来，直到坚韧的鞭子重新驱赶他。”（Л.Н.Андреев 2012a: 230）

除此之外，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和“地下人”相联系的特征还有对现存社会经济理论的厌恶，社会经济理论使人失去人格，剥夺了人们对各自具有独特性的权利，把个性变成“管风琴销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承认自己只在统计学意义上“有益”于社会，如同一个客体，一件物品，一个系统中最小元素。诸如此类的“益处”在主人公内心引起的只是“羞愧和无声的愤怒”。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人”反对象征普世福祉的水晶宫之“暴动”的相似画面。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安德列耶夫那些表面上看似不同的主人公，如犹大、克尔任采夫医生和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等，其身上折射出“地下人”类型的各种特征：犹大有着“地下人”类型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克尔任采夫医生更多的是在实践着“地下人”的“思想纲领”、世界观和哲学理念；而在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形象中作家揭示出“地下人”形成的先决条件和机制，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地下人”世界观的可能之来源。进而使我们得以厘清“地下人”复杂矛盾的人生哲学。“安德列耶夫的创作是关于俄罗斯一个时代的写照。在他的作品中，利他主义、舍己精神、仁爱、对人的信赖与厌恶、自私自利、仇恨、背叛等多种情绪并存，并且常常是以两两相对的形式融合出现在作家独特的艺术世界中。”（刘锟 2004: 3）安德列耶夫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把人的灵魂当做一个混乱与和谐冲突的场所来展示。他们的区别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预示了和谐最终必将获胜，而安德列耶夫则被鲁迅称做是“绝望厌世的作家”，“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鲁迅 1958: 184）

附注

- 1 苏格拉底在辩论中通过问答形式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有助于人产生新思想。

参考文献

- [1] Андреев Л.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1, Москва: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Книговек.2012a .
[2] Андреев Л.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2, Москва: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Книговек.2012b.

- [3] Анненский И.Ф. Книги отражений[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79.
- [4] Беззубов В.И. Леонид Андреев и традиц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M]. Таллинн: Ээсти раамат. 1984 .
- [5] Гроссман Л.П. Борьба за стиль. Опыты по критике и поэтике[M]. Москва: Никитинские субботники, 1927.
- [6]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5,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3а.
- [7]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6,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3б.
- [8] Ермакова М.Я. Проблема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 Л. Андреева[A]//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и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C]. Учен. зап. Горьковский гос. пед. ин-тут им. М. Горького. Горький: Волго-Вятское кн. изд-во, 1968.
- [9] Иезуитова Л.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Леонида Андреева[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логда, 1970.
- [10] Курляндская Г.Б. Л.Н. Андреев и традиции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х[A]//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срединная Россия[C]. Орел: Орлов, 1996.
- [11] 刘 锐. 无奈的追问 无助的抗争——论安德列耶夫的创作中的悲观主义的宗教来源[J]. 俄罗斯文艺, 2004(3).
- [12] 鲁迅. 鲁迅译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The “Underground Person” Tradition of Dostoevsky in Creation of L.Andreyev

Dai Zhuo-meng

(He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s and researchers have always been focusing on Dostoyevsky's influence on Leonid Andreyev. From Andreyev's contemporaries to today's scholars, the interest and focus has continued mainly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of the two writers' writing themes, their common concern of religious moral issues, and mutual attention paid to the irrational and unconscious spontaneity of huma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seemingly literary homology, the two writers are very different in expressing their views and writing methods on people, religion, and morals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existentialism.

Keywords: Andreyev; Dostoyevsky; loneliness; boundary; "underground person"

作者简介: 戴卓萌 (1963—), 女, 上海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中心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 2019-12-30

[责任编辑: 刘 锐]